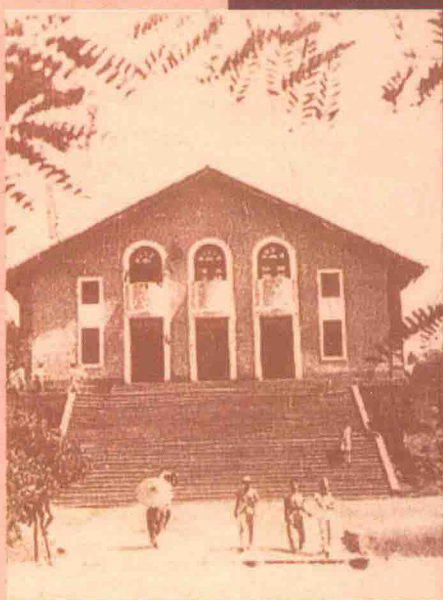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 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研究

张 玥 著



南京大学出

2016年度南京医科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研究

张玥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研究 / 张玥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305-19526-6

I. ①抗… II. ①张… III. ①高等学校—校长—学校
管理—中国—1931—1945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527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研究

著 者 张 玥

责任编辑 贾小芳 官欣欣

编辑热线 025-83592146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 字数 215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526-6

定 价 5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一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0 周年。全面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近些年来逐渐为世人所重视,包含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战争年代的高等教育因其独具的特色和魅力,的确值得进行深入探究和思考。抗战时期大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如何?除了众所周知的西南联大,还有哪些国立大学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的国立大学航船的“掌舵者”,校长在大学的生死存亡之间起到了何等作用?这批大学校长的治校行为与理念是否还可为今日之观照?张玥的这本《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研究》试图回答以上问题,以期对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校长治校的本质有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解答诸如高等教育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大学校长角色与定位,大学发展周期,大学文化引领等历史与现实并存的共性问题。

该书是在张玥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完成的。在博士阶段,她选取了我所主持的研究课题《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之道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深入挖掘,将研究范围聚焦在全面抗战时期,并将之视为研究的亮点之一。她以该书部分内容为基础撰写的论文《大学校长的任职期与领导力实现》发表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上,《大学校长任职内的角色发展》发表于《现代教育管理》,并被《新华文摘》摘编,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研究内容和方向的前沿性和学术价值。

通过对抗战时期大学校长在大学生存、发展和提升中的行为及背后的理念的逐层剖析,张玥将研究主体内容浓缩为“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生存:‘战时需做平时看’、校长与国立大学的发展:‘炸弹下长大’、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提升:‘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等,战时大学生存的根本问题是回答大学的办学方针和宗旨、战时大学的发展是招生规模与师生延揽、

战时大学的提升是基于文化的凝聚和引领。这些观点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也是对当代大学发展的极好启示。当然,研究还涉及大学内迁、通识教育、大学校长领导力等话题,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伴随市场化的浪潮,高等教育的逐年扩招渐渐凸显出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的矛盾: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性目标或区域性目标提前实现;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大学校长领导力提升问题等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质疑与批评不绝于耳。也许,思索抗战时期的大学发展与校长治校,不失为一种寻求镜鉴的思路之一。那么,张玥博士的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了吗?作为她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我很难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高等教育发展中永恒的追问。但是,从本书中不难看出,她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思考是具有独创性的,又是立足历史观照当代的。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勇于进行这样的尝试,实属难得。

是为序。

王运来

2017年11月15日

于南大和园

序 二

“超然”，是指知识分子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非功利化的心态潜心于本身从事的学术创造与创新；“介入”，是指当社会需要时，知识分子必须关注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从社会立场出发，主动介入社会。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的核心，在大学的学术属性与行政权力之间如何抉择，在大学成为“象牙塔”还是“社会服务站”之间如何平衡。这是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的问题起点。

研究旨在以“掌舵人”角色作为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以掌握的史料和文献等资料为基础，以史料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以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与大学的生存、发展与提升为研究展开的基本维度进行分析。组织生命理论中关于组织特征的分类是：组织创建阶段，组织发展阶段，组织成熟阶段。大学作为社会组织之一，也具备这样的组织发展特征。这在文中具体表述为：“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生存：‘战时需做平时看’”；“校长与国立大学的发展‘炸弹下长大’”；“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提升：‘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得益于战时国立大学校长群体的智慧谋略、胸怀担当与个人魅力，国立大学在内迁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保证了“战时需做平时看”的大学发展基调，立志于培养“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并实现了“炸弹下的长大”，从而终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大学发展之根本要义。在此基础上，总结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与当代启示：在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们领先于时代，超越于现实，通过“领导”大学、秉持学术、民主管理、文化建构，进一步引领了社会文化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今的大学管理与发展提供思路，值得今日为之观照。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与大学掌舵人	21
一、抗战前后的国立大学	21
(一) 抗战前建立的国立大学	23
(二) 抗战后建立的国立大学	27
(三) 关于“民国五大学”	32
二、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	33
(一)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任职的概况	33
(二) “大学的危难”与“校长的挑战”	38
三、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角色:掌舵人	45
(一) 大学校长角色论	45
(二)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的“掌舵人”	49
四、小 结	53
第二章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生存:“战时需做平时看”	54
一、国立大学发展的基本问题	55
(一) 抗战前国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55
(二) 抗战初期关于高等教育方针的争论过程	57
(三) 抗战初期的高等教育政策与大学办学经费	64
二、国立大学内迁的共同选择	70
(一)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整体内迁	70
(二) 内迁中校长们“各展其能”	74
(三) 大学内迁的双重意义	88
三、国立大学办学宗旨的确立	96

(一) “国家文化之中心”与大学“教化”功能	96
(二) 教育救国观	97
(三) “全面抗战论”与“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99
(四) “学术救国”之责任	102
(五) 大学“国立化”与“现代化”	102
(六) 患难中的大学认同	103
四、小 结	104
第三章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发展:“炸弹下长大”	106
一、校长与国立大学教师的发展	107
(一) 大学教师的聘用	107
(二) 大学教师的激励机制	113
(三) 大学教师的发展	116
(四) “教授治校”	124
二、校长与国立大学学生的发展	130
(一) 严格选拔和考试	131
(二) 通才教育	134
(三) 办学条件与学术风气建设	151
(四) 以生为本与学生自治	158
三、小 结	163
第四章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提升:“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166
一、国立大学校长文化观的养成	167
(一) 中西两种文化的融会贯通	167
(二) 抗战时期特殊背景的催化	169
二、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文化	171
(一) 科学民主	172
(二) 爱国进步	174
(三) 团结乐观	179
三、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精神和校训	184
(一) 国立大学的精神	184

(二) 国立大学的校训	186
四、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教风学风	189
五、小 结	191
结 论.....	193
参考文献.....	207

绪 论

(一)

当前,“大学校长”研究已然成为教育学界的研讨热点之一,纵观关于“大学校长”的已有研究,可谓分门别类、系统齐全。这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源于大学校长角色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高等教育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当今社会,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拔尖人才和创新技术的竞争,不论是人才还是技术,都与高等教育紧密相关;同时,“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也就是说,校长对于一所大学发展的意义举足轻重,几乎无可替代。他是领导者,指挥者,组织者;还是教育者,研究者,活动家。在任期内校长通过其理念、行为、风格等对大学的发展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所大学的首任校长或是在大学发展的关键阶段有过显著作为的校长,甚至能对这所大学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大学校长在大学的发展中承担了多重角色。厦门大学王洪才教授认为:“现代大学校长应该扮演四种基本的角色:一是学术利益的代言人;二是国家教育政策的执行人;三是学术发展的领导人(规划者和管理者及经营者);四是社会利益的主动反映者。”^①足可见大学校长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二,则是基于世界各国大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重重

^① 王洪才,论现代大学校长的社会角色,大学教育科学,2006:(1).

问题和复杂矛盾。不论是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还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多次遇到过发展瓶颈:如何在维持大学学术自由和服务社会之间找到平衡,如何为大学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而不丢失大学的独立性,如何在教学与研究中达成共赢,等等。面对这些瓶颈,学术界的_{研究}或是从现实总结出路;或是向历史寻找答案;或是以个别杰出人物或先进国家为范例进行改良。因而造就了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持续不断,并日渐升温。

具体说来,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基于现有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和空间

如前所述,学界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十分丰富,如对大学校长治校的理念、行为、角色的研究,以著名大学校长为案例进行的个案或者比较的专门研究等。过去“大学校长研究”倾向于卓越校长的个案研究和描述性、归纳化研究,21世纪以来尤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范围,在研究方法上也包含了定性、定量和二者结合的使用。可谓是“老问题,新视角”。这些研究成果让笔者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受益良多,也为开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

但是,大学是一个非线性发展的组织机构,由于其具有的特定群体特性和人员构成,其办学宗旨和性质的不可转移性,其承担职能和责任的不可替代性,大学发展注定是一个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讨论热点。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组织的“掌舵人”,与大学发展的关系也可谓极其复杂化的学术研究问题。本研究选择以“外部关系处理”、“基本职能”、“师生发展”和“文化引领”作为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四个维度,从横向切面来剖析这一时期的国立大学“掌舵人”所面对的危机与挑战,探求他们的应对之策,即如何引领大学重新走向生机。目前看来,暂且可以算作填补系统研究抗战时期大学校长领域的空白。

2. 基于目前我国大学管理种种问题并存的局面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大学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与发展,取得了相当卓然的成就:不论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的提高,还是我国创新技术和成果的增加,都体现出近几十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性发展。但伴随而来的是大学组织规模的日益膨胀,大学内外部关系的逐渐复杂,大学之间的竞争不断增强,大学的发展矛盾、大学校长面临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大学内部学术文化与院校文化的冲突,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大学校长领导力与教师学生人本性的冲突,大学规模扩张与教育质量下降的冲突;大学外部与社会的二元关系转变为与政府、市场的三元关系,大学职能的延伸与大学自主性的丧失的矛盾,大学走进社会中心与大学学术自由的矛盾,等等。这些冲突与矛盾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大学内部治理与外部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的问题。

至今,高等教育所处的环境仍然发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变革。大学校长这个处于大学与社会、国家、市场中的“人”很难再从从容应对外界和大学内部相应的所有变革。如果把大学发展的外在环境比喻为大江大河,那么大学无疑就是这江河中航行的艘艘航船,大学校长无疑就是这些航船的“掌舵人”。抗战时期的中国国立大学,无疑处在发展的内忧外患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学校长如何掌舵,如何应对危难与困境,寻求生机,对当今大学校长处理大学与社会、政府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3. 基于抗战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和卓越大学校长的涌现

民国时期起自中华民国建立,终于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辉煌阶段,期间,涌现了众多卓越的大学和著名的校长。而研究截取其中的抗战时期(1931年—1945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段,主要是基于这一国难当头,全民抗战的时期,大学处于极端被动的社会大环境之中,发展十分受限,甚至因此出现了国立大学纷纷内迁的特殊局面。即使在这样的危难之中,作为“掌舵人”的大学校长们依然引领大学在危难中力寻生机,在困境中不断从容应对,使得抗战时期我国的国立大学不仅没有受到严重创伤,反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得到切实体现;一大批优秀教师和学子纷纷涌现,很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学科专业的创建者和建设者;大学作为一个社会子机构,不仅培养了人才,发展了学术,内迁后还成为服务和引领当地社会风潮的指向标。这些成就无不与大学“掌舵人”的理念和行为有关:不论是

梅贻琦的“通才教育”，还是罗家伦的“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参谋本部”，或是竺可桢的“求是”精神，抑或是被称为“北大功狗”的蒋梦麟校长，都体现出与世界接轨的进步精神，这些精神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今，都绝不过时。因此，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辉煌时期的著名校长，其本身就极具吸引力。

(二)

1. 有助于充实我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也可以丰富民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

系统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首先有助于充实富有我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同时，也有助于丰富民国高等教育史。程斯辉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关于近代大学校长的研究可以做出“五有、五缺”的判断：即有关于近代大学校长的个体研究，缺关于近代大学校长的群体研究；有关于近代大学校长的微观研究，缺关于近代大学校长的宏观研究；有关于近代大学校长的定性研究，缺关于近代大学校长的实证研究；有关于近代大学校长的纵向研究，缺关于近代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有关于近代大学成功校长的研究，缺关于近代大学失败校长的研究。^①

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高等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其中，抗战阶段又是极具特殊意义的一段历史时期，不可忽略。就整个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研究”来看，就缺乏具有普遍规律和意义的群体性大学校长的研究；且研究大多从校长的个人发展、办学理念和行为等方面进行演绎，缺乏文化视角和先进理论支撑。将抗战时期这一时间段单列开来，对抗战时期大学校长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论文就极少，一度成为研究中的“盲点”。本书旨在对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进行群体性的、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比较性的研究。与程斯辉教授所言的“五缺”大体一致。

^① 程斯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7：4。

2. 有助于推进高等教育学理论和高等教育史学理论建设的共同发展

大学校长治校这一命题既属于高等教育学研究范畴,同时也属于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内容。潘懋元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历史是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例如,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离开了大学校长们丰富的、具体的办学经验,只是从一般管理原则推论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或从一时的得失论述管理的成败,就很难写出内容丰富、科学性强的专著。尤其是涉及高等教育一些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往往非一时所能看清楚,也不是靠有局限性的实验或实践所能解决,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远见。”^①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高等教育管理规律、大学治理的规律等都需要通过对历史的研究进行演绎和总结。那么,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可以视为对高等教育学理论、高等教育史学理论的一种探究。

3. 可为当代大学教育的改革提供范例,为理顺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历史观照

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高等教育的辉煌阶段,因此,大家往往习惯将视线集中于抗战前的大学校长们身上;而抗战时期动乱交加,高等教育的发展虽受到了战事的严重波及,但抗战时期的我国大学发展仍然值得赞颂,这一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们的办学理念与行为更加值得褒扬。在国穷家弱的被动形势下,国立大学校长在处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谋求大学教学研究的进步、支持大学师生们的发展,以及大学文化与精神的引领方面建树颇多。因此,研究他们的治校方略,不仅为当代的大学教育改革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也为协调现代大学与社会、政府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观照。

4. 可为当代大学校长及大学管理人员提供积极的治校镜鉴

现今,我国大学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多种因素有关,或许向历史寻

^① 周川、黄旭,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序),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3.

找答案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在国难当头、临危受命的艰难环境中,始终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坚持以高等教育发展、文化引领和英才培养为救国强国之道,以信念和理念支撑自己办学,使当时的一些大学甚至成为国际公认的知名学府。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足以照亮当下的高等教育管理者们:其办学理念与治校精神,有助于扭转当前我国部分大学存在的精神衰微现象,对于纠正一些大学的功利主义倾向,改进当代大学生的培养方式,提升整个高等教育的品质都具有极大的价值。

(三)

1. 关于“大学校长”的已有研究

国外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不论是从研究内容的划分,还是方法的使用,都比较全面仔细。在研究内容上,涉及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行为、策略,大学校长的角色与责任,大学校长的生活与类型等。

Harold T. Shapiro 的报告《大学校长——过去和现在》(University Presidents: Then and Now)(1996)分析和比较了 19 世纪、20 世纪早期和当代的美国大学校长的工作生活和职务特点,认为“过去”和“现在”的大学校长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学校长的职位是一个多棱镜,某个角度或位置的改变会使它呈现不同的颜色。James L. Fisher 和 James V. Koch 在《企业家型大学校长》(The Entrepreneurial College President)(2003)中先通过对 713 名样本大学校长的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再选取了 17 名成功的企业家型大学校长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最后总结了企业家型大学校长与众不同的特质。H. Keith H. Brodie 和 Leslie Banner 合著的《20 世纪末的研究型大学校长:一种生活周期/案例历史研究法》(The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idenc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 Life Cycle/Case History Approach)(2005)主要以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 Donald Kennedy、曾任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 Harold Shapiro 以及

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 Michael Sovern 为案例,将校长职位分为适应期、蜜月期、稳定期及离职期四个时期,叙述了这三位校长的办学实践,并对他们在四个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和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与总结。许美德所著《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2008)考察了作者长期接触的 11 位中国教育家的职业生涯,以“教育叙事”的方式体现“知人论世”,其中也涉及了像朱九思这样的我国知名大学校长。

近年来,随着“大学校长热”的升温,国内外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加,其中不乏国外经典著作的译作问世。如北大高等教育文库的大学之道丛书,如黄俊杰主编的《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实务》(2006),迈克尔·D. 科恩,詹姆斯·G. 马奇等著,郝瑜译的《大学校长及其领导艺术:美国大学校长的研究》(2006),查尔斯·维斯特所著的《一流大学,卓越校长》(2008),克拉克·科尔著,赵炬明译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与性格》(2008)等。这些译作使大学校长的研究跨越了国界,有利于我们吸收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

当前,国内围绕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的讨论如火如荼,成果颇丰,不管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可谓成果卓然。综合说来,从研究内容角度,主要包括对不同时期大学校长的研究,大学校长的能力与素质、理念与管理、角色与责任、遴选与任用,大学校长职业化,校长个人因素对管理和大学发展的意义考察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则主要包括历史研究和现实考察,案例研究和群体研究,定性推理和定量分析。国内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从专著到论文,从民国大学校长的研究到新中国、近现代大学校长的研究,从个案性的大学校长研究到群体性的校长研究,等等。

我国关于“大学校长”研究的专著始于李钟善主编的《大学校长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1989)一书。此后对教育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专著有周川、黄旭的《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1994)、逢锦聚《大学校长与企业家世纪对话》(2000)、眭依凡《学府之魂: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教育理念》(2001)和《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2001)、章开沅主编《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2004),以及教育部举办的

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组委会的组编文集(现共有4辑)等。这些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于“大学校长研究”的关注度的加强以及“大学校长研究”的方向变化:从最初的以为国家服务导向的“大学校长研究”,过渡到从我国历史上卓越校长的精神理念来解现实之问,进而发展到大学校长角色与类型的讨论,并结合社会发展之实际、大学发展之困扰来寻求“大学校长研究”的新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章开沅主编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以民国著名大学校长为对象进行的个案研究,系列丛书包括了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郭秉文、张伯苓、陈垣、陈裕光、吴贻芳这些杰出的大学领袖。《书系》不仅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更为研究补充了翔实的史料来源。

2. 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治校”的已有研究

民国是我国大学发展的辉煌时期,也是大学校长中“人杰”辈出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对象,总结起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某个大学校长某一方面办学思想和实践的研究。目前的大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方面,如梁吉生主编的《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平欲晓、张生的《一个教会大学校长的生存状态——陈裕光治理金陵大学评述》(2006),新华网登载的“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2010)等。

第二,对某个大学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进行总体研究。如王文田所著的《张伯苓与南开》(1968),马勇所著的《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1997),章开沅主编《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2004),梁柱的《蔡元培与北京大学》(2006),靳宇倡的“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大学的核心价值观”(2006),谢小燕的“大学校长应向蔡元培先生学习什么”(2004)等。其中,《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一)》以个案形式将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描绘:蔡元培(北京大学),梅贻琦(清华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唐文治(南洋大学)、郭秉文(东南大学)、张伯苓(南开大学)、马相伯(复旦公学)、陈垣(辅仁大学)、陈裕光(金陵大学)、吴